

第三章 調查課的業務梗概

調查課的主要業務為統計和各種調查，並留下大量的出版品。透過探討總督府的出版品之來龍去脈，對了解當局的施政構想及台灣社會之變遷，實具有一定的研究意義。日治時期，總督府謹慎管制圖書，來自中國的進口始終是府方警戒的對象，但在處理上則相當棘手。¹當局掌控中國書報的流入，為此 1925 年 7 月發行的《臺灣民報》社論嚴厲批評該項政策。²眾所皆知，矢內原忠雄的書被禁止在台發售。³然而，此一時期總督府等公私單位出版許多的書刊，同時，經由購買等管道，藉此累積龐大的資料庫。隨著殖民統治的結束，留下來的數量書刊也就成了研究台灣過去的重要憑藉。⁴

總督府如何收集各種書刊，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歷史課題。尤其，當局若想開展研究工作，最基本的要求莫過於完備的圖書資料，同時，良好的典藏亦能吸引有志者前來一展長才。因此，宮尾舜治在殖產局長任內為使部下吸收新知，允許可以自由買進圖書。⁵素木得一回憶 1907 年擔任札幌農學校副教授時，宮尾舜治向校長佐藤昌介表示要聘用昆蟲學者，於是松村松年請素木去面見宮尾，宮尾對其說如果前往台灣，將可以自由買書，以及充分作研究；於是素木滿懷期待，同年

¹ 詳見以下的資料：

(1) 《外務省記錄》，〈台灣ト南支那トノ關係及現在ノ施設並将来ノ方針〉及〈台灣ト南支那トノ關係〉。(資料來自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2)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台北：該局，1933.12)，頁 167~168。

(3) 《臺灣日日新報》，1921.7.17 〈對岸から北部へ書籍の輸入激増〉；1921.9.9，〈支那出版の書籍が五十萬冊も本島へ〉。

(4) 《大阪昭日新聞》，1916.4.19~24，〈台灣の警察政治〉。(資料來自神戸大學「新聞記事文庫」)

² 詳見：社説，〈對於輸入中國書報的臺灣海關的無理干涉〉。稅關控管的程度，亦可參見：江亢虎，《台游追紀》(上海：中華書局，1935)，頁 5。

³ 宮川次郎，《台灣の政治運動》(台北：台灣實業界社，1931.8)，頁 295~299。不過，宮川此文意在譏評矢內原是「紙上的殖民學者」。

⁴ 二次大戰後，台灣的知識份子極為關心中國政府如何接收文獻。楊雲萍曾在 1945 年 10 月《民報》撰文，以《史記》所載蕭何接管秦國圖書的史事為楔子，主張必須妥善加以處理。(資料來自舊版報紙資訊網)

⁵ 黑谷了太郎(編)，《宮尾舜治傳》(吉岡荒造發行，1939.4)，頁 244~245。

10月抵達台北。⁶

總督府的出版品一向頗受到矚目，除了日本帝國內部之外，其它國家乃至各殖民地政府也都相當留意，並來函索取；當局也經常主動對外寄送。有時，總督府亦撥款購買必要的參考書。⁷因此，研究書刊的傳播，實有助於理解殖民統治的特質。總督府檔案中留有許多關於書刊流通的文件，由此可知透過互惠不僅建立總督府與外界之聯繫，也使當局能夠有效掌握最新的資訊，有助於實施各種政策。以下試舉數例說明之。

首先，以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為例，會長後藤新平於1905年7月致函陸軍次官石本新六，告知《清國行政法》第一卷業已完成，欲寄給在滿洲的各軍政單位作為參考，並請對方將需要的冊數回報京都帝大法科大學之內的舊慣調查會。⁸當時，中國的官紳對於本書也有很高的評價。⁹此外，舊慣調查的資料也曾作為中國北京政府與荷蘭東印度政府的參考資料。¹⁰其次，總督府進行土地調查的成果，也受到鄰近中國的重視。例如許世英擔任福建巡按使期間，於1914年派程家穎

⁶ 素木得一，〈思ひ出の一、二〉，出處同上，頁28~30。

⁷ 例如1914年8月，殖產局同意糖業試驗場可直接購買參考書刊，包括西文圖書五百二十五圓、日文圖書四十八圓及西文雜誌三百五十九圓，合計九百三十餘圓。參見：第5879冊《大正三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三二卷》，第23號〈糖業試驗場參考用圖書ノ件〉。

⁸ 其後，陸軍次官的回覆如下：陸軍省5冊、參謀本部5冊、教育總監部2冊、滿洲軍總司令部3冊、遼東兵站監15冊、關東州民政署10冊，共計40冊；惟因該省始終未能收到，在確認該會尚有剩餘之後，在翌年4月才分送參謀本部6冊、教育總監部3冊、關東總督府15冊，以及關東州民政署10冊。參見：《陸軍省老日記》，〈書籍寄贈の件〉。《清國行政法》由京都帝大教授織田萬負責編纂，其向後藤新平推薦狩野直喜以為協助，並聘用淺井虎夫從事相關作業。此外，東川德治和加藤繁則於1907年參加編務。迄至1913年底總共出版六卷，1914年重新改訂第一冊，1915年進而出版索引。參閱：山根幸夫，〈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の成果〉，《近代中國と日本》（東京：山川出版社，1976.2），頁94~102。

⁹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7.10，〈北京通信〉。本篇報導的內容指出他們對於本書，「贊嘆不置，至將該書翻譯、刊刻問世；聞清之愛寶是書者，因其著作甚完善，凡關清國行政制度，搜抉無遺，讀此書當知自國之行政機關也。」

¹⁰ 片山秀太郎，〈岡松博士と台灣の立法〉，《台灣時報》第31號（1922.2），頁22~23。

調查台灣的土地制度，據之撰寫報告書，以供該省清丈作為參考。¹¹同年 12 月，總督府給予程氏有關台灣土地調查的資料，包括書籍五冊和地圖十八張。¹²此外，日本殖民地的朝鮮與關東州、中華民國福建和廣東二省政府、澳洲及紐西蘭，亦曾請求有關土地調查的資料。¹³再如 1943 年 2 月，日本海軍西里伯斯(Celebes)政務部向總督府文書課請求寄贈資料，該部認為統治台灣初期的經驗相當具有參考價值，同時，也希望獲得《南洋年鑑》和南洋協會等出版的圖書。¹⁴

以下，檢討調查課的統計和調查業務，並對其評價加以探討，以究明總督府出版品的流通管道，及其箇中意義。

第一節 統計業務及其評價

關於日本在台灣的統計事業，1946 年擔任長官公署統計室主任專員的胡元璋曾有相當客觀的評述，其謂：考其過去所以獲得昭著的成績，能收發揮效能的原因，不外機構嚴密，人員充實，經費充沛，並能五十年來如一日的繼續不斷的向前邁進，從不間竭。¹⁵然而，在戰後的仇日氛圍之下，當《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一書出版時，《中央日報》在書評中則宣稱：日本於統治臺灣時期，對於統計之工作，極為重視。蓋欲藉統計以逞其壓榨之陰謀也。¹⁶動機論顯然是清理殖民主義的有力工具。

¹¹ 程家穎，《台灣土地制度考查報告書》（臺北：台灣銀行，1963.11），頁 1~6。

¹² 第 5937 冊《大正四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三十九卷》，第 6 號〈台灣土地調查ニ關スル報告書寄贈方ノ件回答〉。

¹³ 土肥慶太郎，〈土地調査の回顧〉，《台灣時報》（1935.6），頁 38。

¹⁴ 文書課於 3 月備妥資料後，向國土局報告可以寄送。參見：第 11497 冊《昭和十八年一月起雜書》，第 12 號〈參考資料寄贈方依頼ノ件〉。至於在書刊的交換方面，例如 1911 年印度商務通報局請日本外務省向總督府要求總督府寄贈《台灣外國貿易年報》，總督府則希望交換彼此的出版品，於是加爾各答領事館回報該局願意每年寄贈《英國印度之海上貿易運輸年報》（**Annual Statement of the sea-brone Trade and Navigation of British India**），該書由總督府稅務課加以保管。參見：第 5507 冊《明治四十五年大正元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六十一卷》，第 17 號〈印度政府商務通報局刊行物寄贈方ニ關スル通牒〉。

¹⁵ 胡元璋，〈介紹臺灣統計事業〉，《臺灣所藏中華民國經濟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10），頁 465。

¹⁶ 《中央日報》，1947.7.21，（八），〈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論者指出日治時期土地調查與人口普查，符合規訓權力對知識的要求。¹⁷不過，近代統計如何被引進殖民地臺灣的關係，調查課的統計業務之具體內容及其評價為何，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官房調查課從統計課改制而來，該課在統計業務上所繼承的基礎，可藉由考察台灣統計協會的作為加以了解。

日治初期，即出現欲精確掌握人口的呼聲。1901年，加藤隆作在《統計學雜誌》撰文主張在臺灣進行民勢調查，用以建立完整的戶籍簿制度，況且日本國內遲早要實施人口調查，臺灣正好可作為試調的場所。¹⁸同年，窪田貞二也在《統計集誌》撰文希望台灣盡速實施國勢調查。¹⁹1903年9月，總督府著手準備國勢調查。²⁰同年11月成立的台灣統計協會，乃是1905年戶口調查事務的唯一協助機關。²¹

該會首任會長為祝辰巳，屬於後藤新平派閥。²²他在說明該會成立的背景與抱負時，認為台灣人相當欠缺精確數字的觀念，只要試著向他們提出有關的問題，沒有一次不是用形容詞『差不多』來回答，但時勢決不容許如此下去。²³臺灣銀行董事長柳生一義，本身對於行員所寫的報告即嚴格要求統計數字的正確。²⁴他致詞希望眾人熱心組成團體研究，能早日消滅「差不多」主義，該行的業務亦將蒙受好處。

¹⁷ 姚人多，〈認識台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2期（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1.6），頁119~182。

¹⁸ 加藤隆作，〈先づ臺灣に「センサス」を施行す可し〉，《統計學雜誌》第185號（東京：統計學社，1901.9），頁213~215。

¹⁹ 窪田貞二，〈臨時臺灣戶口調査ヲ追想シテ所感ヲ述ブ〉，《臺灣統計協會雜誌》第44號（台北：該會，1909.10），頁55。

²⁰ 杉山靖憲，〈臺灣歷代總督之治績〉（東京：帝國地方行政學會，1922.5），頁154。

²¹ 參見：《台灣慣習記事》第5卷9號（台北：台灣慣習研究會，1905.9），頁40。

²² 祝辰巳後來受到後藤的推薦而當上佐久間左馬太總督的民政長官，因為後藤偏愛讓下屬接替自己現有的職位。參閱：黃昭堂，〈臺灣總督府〉（東京：教育社，1983.10），頁91。祝氏在1908年5月逝世，享年41歲，後藤並為他撰作墓誌銘，推崇其「獎殖產興業，樞樞腦煙鹽，治績大舉，臺灣財政有今日，其功居多矣」。參見：《後藤新平文書》R36（東京：雄松堂，1980.2）。

²³ 祝辰巳〈臺灣統計協會發會式ノ辭〉，《臺灣統計協會雜誌》第1號（1903.11），頁22~23。

²⁴ 高木復亨，〈克く行員を養成された〉，《柳生先生を憶ふ》（東京：吉野小一郎編輯，1932.3），頁70~75。

「名譽會員」後藤新平則認為，會員們如果不能擔當國勢調查的重任，則本會終究毫無存在的價值。²⁵後藤對於台灣的人口調查極為重視，常使部屬感受極大的壓力。例如總督府曾經爲了有人向大阪的某家報紙披露關於戶口調查的惡評，而到處搜查對象，聽說後藤以爲當事者就是小松吉久，小松被迫非要辭職不可，但小松始終加以拒絕，問題於是不了了之。²⁷後藤熱中統計事業，除了科學思想之外，也可以說因爲他是喜愛豪華事業的行政家；當然，實際的需要亦是一項主因；或者，根本就是後藤迷戀統計的緣故。²⁸

無論如何，總督府高層對於未來所要實施的人口調查，高度期許統計協會能盡力而爲。其它與會的重要人士，或肯定創會之舉²⁹，或祝福會務健全等。³⁰就連曾與總督府對立的中村啓次郎，也表示創會的時機恰當。³¹

該會的主幹人物爲水科七三郎，他在會誌上撰寫了許多文章，致力於普及統計知識。³²此外，水科與後藤新平的關係良好，曾在後藤

²⁵ 柳生一義，〈臺灣統計協會發會式二於ケル演說〉，《臺灣統計協會雜誌》第 2 號（1904.1），頁 2~5。

²⁶ 後藤新平，出處同上，頁 24~26。

²⁷ 小松吉久，〈後藤棲霞伯〉，《始政五十年臺灣草創史》（台北：新高堂，1944.12），頁 295~298。

²⁸ 豬間驥一，〈故後藤新平伯と統計事業（續）〉，《統計集誌》第 577 號（1929.7），頁 28~29。

²⁹ 鹿子木小五郎，〈臺灣統計協會發會式二於ケル演說〉，《臺灣統計協會雜誌》第 19 號（19.），頁 5~8。

³⁰ 木下新三郎，同上，頁 8~11。

³¹ 中村啓次郎，同上，頁 11~15。中村於 1896 年 4 月來到台灣，原本是在日本的遼東半島總督府民政長官茨木惟昭之下從事遼東的歷史編纂，他心裡想著可以在台成爲高等官，然而因爲同時牽涉到友人谷信敬的昇任，半年過後的 10 月遂提出辭呈。參見：氏著，〈私の灣吏生活〉，《台灣大觀》，頁 164~166。中村與總督府的對立，問題的癥結在於是否讓臺灣人加入日本民籍，他與佐佐木安五郎等人以《臺灣民報》而與總督府對立，惟報紙遭到禁止發行，各人亦在入籍截止以前被繫於牢獄。參見：白面人，〈寄手一方旗頭 中村啓次郎君〉，《》（東京：，1926），頁 168。由總督府檔案可知，台北地方法院在 1896 年 12 月以「詐欺取財被告」的名義將中村收押，一直到 1897 年 6 月才因「免訴」而釋放了他。參見：第 4536 冊《明治三十年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九》，第 38 號〈勳八等中村啓次郎台北法院へ拘留免訴具申書拓殖務大臣へ進達〉。

³² 詳見：高橋益代，〈『台灣統計協會雜誌』總目次 解題〉（東京：一橋大學，2005.5）。水科年輕的時候，1884 年在共立統計學校當旁聽生，杉亨二某日出

的指導下編纂日英對譯的《臺灣十年間之進步》，1906年2月出版後廣為分送各界³³，該書向海外分送了170冊，以德國33冊最多，其次為美國27冊。³⁴伊能嘉矩曾經為文介紹該書，並對水科技師表達由衷的謝意。³⁵《臺灣慣習記事》回顧1906年的學術界時，則認為本書是台灣研究者必備的書籍。³⁶後藤新平去世時，水科的身分為拓殖大學講師，該校校長即是後藤，可見其回到日本國內之後，仍與後藤保持來往。³⁷

證諸該會的表現，不僅刊行機關雜誌、翻譯外國文書、發行特別出版品、舉辦講演會，也盡力贊助前3次的人口調查事業和在總督府召開的6次統計講習等，1920年底解散後，其事業交由《臺灣時報》發行所承接。³⁸

台灣統計協會的雜誌是日本國內學者發表意見的重要園地。³⁹學者也能藉由本書吸收新知。⁴⁰尤其，會誌定期介紹總督府出版的統計

了作業，水科提出上課筆記和心得，幾天之後，被叫了過去，杉氏說道將學問的艱深談得、寫得讓每個人了解是相當重要的事。此一教訓對水科產生很大的影響。參見：氏著，〈杉先生逸話〉，《臺灣統計協會雜誌》第146號（19.），頁59~62。

³³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東京：後藤新平伯傳記編纂會，1937.7），頁400~406。鶴見寫道後藤的主張常可見活用統計的影子。此外，伊藤金次郎關於台灣的國勢調查也寫道：後藤豪放的另一面是縝密而細心的思索家。參見：氏著，《新領土開拓と後藤新平》（：昭和書房，19.），頁185。

³⁴ 雜報，〈『臺灣十年間之進步』ノ配付〉，《臺灣統計協會雜誌》第16號（1906.3），頁87。

³⁵ 梅陰生，〈臺灣十年間之進步〉，《臺灣慣習記事》第6卷5號（臺北：臺灣慣習研究會，1906.5），頁451~453。

³⁶ 月旦子，〈台灣に於ける學術界の三十九年史觀〉，《臺灣慣習記事》第7卷2號（1907.2），頁64。

³⁷ 水科七三郎，〈後藤伯と統計〉，《吾等の知れる後藤新平伯》（），頁314~318。水科後來在1940年4月過世，享年78歲，關於其生平可參閱：石村義典、石村櫻，〈「水科七三郎」ノート（覺書）—北海道における山岳高層氣象觀測，氣象觀測行政および統計教育，台灣戶口調査を中心として—〉，《拓殖大學論集》人文・自然科學2-3（東京：編集委員會，1994.12），頁143~195。

³⁸ 《臺灣日日新報》，1920.12.28，〈臺灣統計協會解散〉。

³⁹ 例如，日本關於國勢調查的請願，在1896年即向貴、眾兩院提出，但遲遲未見實施，京都帝大的副教授財部靜治於是在1908至1909年間撰文投稿《法學新報》與《台灣統計協會雜誌》以表達意見。參見：財部靜治，〈國勢調查卜時〉，《京都法學會雜誌》第4卷6號（京都：京都法學會，1909.6），頁145~160。

⁴⁰ 雜報，〈高田學士ノ近信〉，《臺灣統計協會雜誌》第131號（1916.12），頁64。高田任教於京都大學，他很高興能讀到該會譯介的〈作為獨立的學術之統

書籍，使各界能獲知新的訊息。⁴¹台灣人士紳陳直卿即不時捐款給該會，並且感謝能收到會誌，顯示其再台灣人方面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喜愛。⁴²要之，官房調查課繼承了上述既有之基礎，對於其統計業務之進行實有莫大的助益。

依據各年度《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可知調查課歷年的統計業務之梗概，除了國勢調查之外，主要包括修改報告例、犯罪統計、統計事務的監督、人口動態統計、派員前往地方或日本中央參加各種統計相關的會議，以及各種統計。⁴³

調查課的統計出版品，分成不定期與常年出版二種。前者包括因應 1923 年日本皇太子來台而出版《臺灣現勢要覽》，其後則持續刊行⁴⁴；該書為 2 百頁的小冊，內容計有 53 個項目，並附錄相關的比較圖表，目的在於使人一讀便知台灣的情形與地位⁴⁵；此外，該課為了「始政」三十週年而出版《最近ノ臺灣》⁴⁶，1926 年時出版《台灣大觀》與《英文台灣案內》⁴⁷，1928 年時出版《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

計方式當中的總論及結論)。

⁴¹ 雜報，〈本會雜誌配付數〉，《臺灣統計協會雜誌》第 61 號 (1911.2)，頁 46～47。在 1910 年，當時向島內分送 16054 冊，日本國內則有 1700 冊，以東京的 626 冊最多，至於外國 (清國) 為 96 冊，合計 17850 冊。

⁴² 根據 1916 年出版的《臺灣列紳傳》，陳氏「自幼讀書，夙志于醫，欲成名于杏林，師事黃玉階先生，覃思研精，凡四年……明治三十三年授佩紳章，翌年下付醫生許狀，四十三年推薦保正」。他與統計協會之間的往來，詳見以下各期的雜報：〈統計學熱心ノ本島人〉(第 6 號)、〈陳氏卜幹事長ノ往答〉(第 26 號)、〈書翰〉(第 81 號)、〈所感〉(第 93 號)、〈所感〉(第 105 號)、〈陳直卿氏ノ書翰〉(第 119 號)。資料顯示，陳氏對其它事件也做過捐輸，例如 1906 年底歡迎祝辰巳，以及 1908 年中歡迎大島久滿次，都曾捐出 10 圓以示歡迎。由此可見台灣人士紳與總督府互動之一斑。參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12.7、1908.6.25，〈歡迎會之寄附金〉、〈歡迎樂輸〉。

⁴³ 詳見：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1918~1939 年度。

⁴⁴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1923 年，頁 85。裕仁在 1921 年 11 月已就任攝政，故而台灣行可以說是最高地位的天皇制人格象徵之展現，亦即透過巡視使民眾見識代表正統的天皇，同時讓天皇飽覽整齊有序的臣民；迎接東宮的活動，無論行政機關、教育機構及軍事單位，或展覽會的物品和運動會的身體展示，皆以各自日常經營的成果提供皇太子過目為核心。參閱：若林正文，〈一九二三年東宮台灣行啓と「內地延長主義」〉，《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東京：研文，2001.6)，頁 379～389。

⁴⁵ ，〈台覽「臺灣現勢要覽」の出版〉，《臺灣時報》第□號 (19.)，頁 115。

⁴⁶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1925 年度，頁 165。

⁴⁷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1926 年度，頁 189。

⁴⁸，1930年時出版《台灣住民の生命に關する研究》⁴⁹，以及在1936年出版《台灣住民ノ生命表》。總督府認為藉由生命表不僅能得知台灣居民的生命長短與健康狀態，也能提供恩給、年金、在職加俸、生命保險事業等其他社會政策的基礎資料。⁵⁰

1934年，總督府技師曾田長宗利用1930年調查課出版的《台灣居民生命之調查》（《台灣住民の生命に關する調査》），針對肺結核的死亡情形加以分析。曾田指出日本國內的日本人處於青年期時，因肺結核死亡者占壓倒性多數，台灣人則以50歲前後為高峰；根據臨床專家的經驗，台灣的結核患者大抵為慢性病人。因此，曾田認為在預防和撲滅事業上，必須仔細計算帶原者的人數，也該注意其家庭環境的改善，更應考慮對兒童身體的影響。⁵¹

1941年底，日本召開第五屆人口問題全國協議會，曾田長宗當時擔任台北帝大教授，其向大會提出的報告利用國勢調查之結果，推估台灣的飽和人口約為700至800萬人；此外，利用《南洋年鑑》等資料，計算主要國家、日本及台灣每人所擁有的國土面積與耕地面積，其結果表示台灣人口達到飽和時，每人的耕地面積為0.12公頃，國土面積則是0.51公頃。曾田除了運用官房的出版品之外，對於大會的說明顯示其相當關心勞力不足的問題，認為應加強人口增殖的政策。⁵²

⁴⁸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1928年度，頁182。

⁴⁹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1930年度，頁135。

⁵⁰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1936年度，頁138。除了政策面之外，時人越原久明曾以本書配合水島治夫的《朝鮮住民之生命表》（1938年2月），針對二地的死亡率作出分析。略謂：關於台灣居民的生命表，最近有高田他家雄從醫學的角度發表各種研究，然若就保險數學的立場來使用台灣與朝鮮的死亡率表，結果顯示台灣男性與朝鮮男性的死亡率大體相似，平均壽命也很接近，以30歲為例，台灣比日本少了4.3歲，朝鮮則少了3.8歲，因此契約的標準必須比日本人更為嚴謹。詳見：越原久明，〈台灣住民及朝鮮住民の生命表に關する計算〉，《》（東京：矢野恒太君保險關係五十年記念會，1941.10），頁337~359。

⁵¹ 曾田長宗，〈內台生命表の比較に現はれた肺結核死亡の影響—台灣の肺結核死亡は高年者に多し—〉，《社會事業の友》第65號（台北：台灣社會事業協會，1934.4），頁15~24。

⁵² 曾田長宗，〈台灣本島人の將來人口に就て〉，《人口政策と國土計畫》（東

至於 1918 至 1938 年度的統計出版品，如表 4-1-1 所示。至於時人如何看待各種出版品，分成（一）人口動態統計、（二）犯罪統計、（三）台灣事情，以及（四）統計書加以說明。

表 3-1-1 調查課的統計出版品一覽

| 年度 | 台灣人口動態統計 | 記述報文 | 台灣犯罪統計 | 台灣事情 | 台灣現住人口統計 | 台灣第__統計摘要 | 台灣第__統計書 | 台灣現勢要覽 |
|------|----------|------|--------|---------|------------------|------------------|----------|--------|
| 1918 | T5 | T5 | T5 | T6 | T6 | 13/T6 | 21/T6 | x |
| 1919 | T6 | T6 | T6 | T8 | x | x | x | x |
| 1920 | T7 | T7 | T7 | T9 | T7 | 14/T7 | 22/T7 | x |
| 1921 | T8 | T8 | T8 | x | T8 | 15/T8 | 23/T8 | x |
| 1922 | T9 | | T9 | T10、T11 | T9、T10 | 16/T9 | 24/T9 | x |
| 1923 | T10 | | T10 | T12 | T11 | 17/T10 | 25/T10 | x |
| 1924 | T11 | | T11 | T13 | T12 | 18/T11 19/T12 | 26/T11 | x |
| 1925 | T12 | | T12 | T14 | T13 | 20/T13 | 27/T12 | T14 |
| 1926 | T13 | | T13 | T15 | x | 21/T14 | 28/T14 | T15 |
| 1927 | T14 | | T14 | S2 | T14、S1 | 22/S1 | 29/T14 | S2 |
| 1928 | S1 | | S1 | S3 | S2 | 23/S2 | 30/S1 | S3 |
| 1929 | S2 | | S2 | S4 | S3 | 24/S3 | 31/S2 | S4 |
| 1930 | S3 | | S3 | S5 | S4 | 25/S4 | 32/S3 | S5 |
| 1931 | S4 | | S4 | S6 | S5 | 26/S5 | 32/S4 | S6 |
| 1932 | S5 | | S5 | S7 | S6 | 27/S6 | 33/S5 | S7 |
| 1933 | S6 | | S6 | S8 | S7 | 28/S7 | 34/S6 | S8 |
| 1934 | S7 | | S7 | S9 | S8 ⁵³ | 29/S8 | 35/S7 | S9 |
| 1935 | S8 | | S8 | S10 | S9 | 30/S9 | 36/S8 | S10 |
| 1936 | S9 | | S9 | S11 | S10 | 31/S10 | 37/S9 | S11 |
| 1937 | S10 | | S10 | S12 | S11 | 32/S11 | 38/S10 | S12 |
| 1938 | S11 | | S11 | S13 | S12 | 33/S12 | 40/S11 | S13 |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1918~1938 年度。

京：財團法人人口問題研究會，1942.11），頁 25~30。

⁵³ 改名為《台灣常住戶口統計》。

（一）人口動態統計

關於台灣的人口動態統計，東京人類學會曾經加以介紹。⁵⁴在此以學者為主，藉由考察京都帝大歷史學教授內田銀藏(1872~1919)⁵⁵，以及東京帝大統計學教授高野岩三郎(1871~1949)，已深入了解總督府官房的出版品透過何種機制送達他們的手中，及二人對於台灣的統計出版品抱持何種看法。

（1）內田銀藏的歷史隨筆

內田銀藏是一位重視歷史材料的學者，他也常告誡學生盡可能放寬眼界。⁵⁶1925年入學京都帝大的小葉田淳，雖然無緣親炙內田門下，但透過閱讀相關著作，或認識受內田影響的人，他認為自己可算是向內田老師請益過的學生。⁵⁷1916年4月，臺北召開臺灣勸業共進會。該會係教化台灣人的政策之一，也是向日本國內進行宣傳的大好機會。⁵⁸內田來臺一遊，其後並將感想以〈臺灣旅行談〉⁵⁹為題，登載於

⁵⁴ (1) 雜報，〈台灣漢族の人口動態〉，《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264號（東京：該會，1908.3），頁233~236。本文節錄水科七三郎在《台灣日日新報》上所寫的文章，重點在於指出1906年的人口動態統計可讓人探討台灣人男女的初婚年齡。(2) 雜報，〈台灣人口動態統計記述報文〉，第287號(1910.2)，頁203~204。本文抄錄二則可供研究台灣人民生活狀態的參考資料，其一是健康與不健康地帶的序位，其二則是結婚年齡的比例，指出無論男女，台灣人都比日本國內早婚一個層級。

⁵⁵ 內田的生平介紹，可參見：西田直二郎，〈內田銀藏先生小傳〉，《日本經濟史の研究（上）》（東京：河出書房，1944.3），頁1~7。西田為內田的學生，受其薰陶，亦是日本文化史的大家，1932年由改造社出版的《日本文化史序說》為代表作，在戰前報考高等文官考試的人大都會閱讀此書。參閱：梅溪昇，《たいまつの火》（大阪：株式會社ブレーンセンター，1998.7），頁46~55。

⁵⁶ 清原貞雄，〈三浦內田兩先生の憶出斷片〉，《史學研究》第11卷3・4號（東京：廣島史學研究會，1940.3），頁230。

⁵⁷ 小葉田淳，〈臺大時代の思い出〉，《思い出の道 引揚を経験した一歴史家の足跡》（京都：作者發行，1999.12），頁23~24。

⁵⁸ 《下村宏文書》第6號〈台灣統治ニ關スル所見〉。（原藏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旅行活動的特色，可參閱：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旅遊活動與地理景象的建構〉，《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12），頁294~295。

⁵⁹ 內田銀藏，〈臺灣旅行談〉，《史林》第1卷4號（京都：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內史學研究會，1916.10），頁~。

學報《史林》。⁶⁰

文中，內田除了提到台灣人口的增加之外，也注意台灣人的同化問題，認為教育的普及和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非常關鍵；其次，內田曉得水科七三郎在幾年前發表了有關臺灣兒童發育的研究成果，他也認為必須重視日人身體的保健；再者，他以長遠的歷史眼光關心台灣文明對日本國內的影響，深刻思隨考著領土擴張和殖民發展而產生的新日本人是什麼樣子的人。⁶¹

內田之所以注重人口在歷史中的意義，實際上來自個人的學術關懷，發表遊記的前後，他正要介紹馬爾薩斯（1766~1834）的生平、著述及影響。⁶²然而，總督府對來到殖民地的國內日人應當看到什麼，事實上早有準備。⁶³因此，重視研究歷史應進行實地調查的內田⁶⁴，和別的觀賞者一樣，映入他們眼簾的內容事實上經過了安排。⁶⁵

翌年 7 月，內田撰寫〈讀臺灣人口動態統計十年報〉一文，介紹官房統計課於 6 月所出版的《自明治三十九年至大正四年臺灣人口動態統計十年報》。⁶⁶內田在文中提及 1916 年春天前往臺北參觀勸業共進

⁶⁰ 本文簡單導覽台灣的歷史古蹟，在人物方面內田僅提到測候所長近藤久次郎。近藤被譽為日本氣象學界先驅，關於其生平可參見：荒川秀俊，《日本氣象學史》（東京：河出書房，1941.12），頁 123。

⁶¹ 內田的遊記後來得到了迴響。栗野秀穗於 1918 年 9 月在《歷史と地理》第 2 卷 3 號撰有一篇〈台灣の人口と理蕃事業〉，他在文中引用〈臺灣旅行談〉的其中一節，不過，栗野認為日、台之間由於（1）同文、（2）儒教的感情、（3）歷史上的中日往來，以及（4）居住與米食文化等某些風俗習慣有相似共同之處，彼此的差距不若英、法二國與其東南亞殖民地之大，因此最終將能完成同化。

⁶² 內田銀藏，〈まるさす略傳〉，《經濟論叢》第 2 卷 5 號（京都：京都大學經濟學會，1916.5），頁 633~656。

⁶³ 就像後藤新平早就說過，「苟除去此統計，其所設博覽會，縱極為壯麗，終無可寓目者」。參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11.21，〈後藤民政長官演說（二）〉。

⁶⁴ 根據西田直二郎的回憶文字可知，在京大史學科一年級修習史學研究法時，因有一位同學選定探討福原遷都的問題，內田某日於是帶了學生特地到神戶去勘查可能是故都古蹟的地方。參見：氏著，〈內田先生〉，《藝文》（京都：京都文學會，1919.10），頁 86~87。

⁶⁵ 詳見：西岡英夫，〈勸業共進會と統計ノ應用ニ就テ〉，《台灣統計協會雜誌》第號，頁 20~21。

⁶⁶ 內田銀藏，〈臺灣人口動態統計十年報を讀む〉，《日本經濟史の研究》（東京：同文館，1921.6），頁 351~359。

會，根據展出的統計圖表可知臺灣的瘧疾患者死亡數正逐年遞減，不過到了 1915 年卻突然增加，由於仍記著此事，一收到本書便檢視第 44 表（種族、體性及死因別死亡表），得知台灣人與日本人雙方在瘧疾患者死亡數方面，1906 年以降概呈減少的趨勢，1914 年較前年為多，1915 年突然顯著增加，臺人達十之年間的最高峰，日人亦是次於 1906 年的第 2 位；接著更翻查相關的表格，比方利用第 28 表試算 10 年之間的死亡率千分比等。內田以為臺灣的衛生環境逐年改進，何以最後 2 年反而比以前退步，推測應該不是衛生的因素所致，而且瘧疾之外的疾病死亡也以 1915 年較多，亦可旁證。

同年 8 月，內田又寫了一篇文章〈臺灣的死亡率與疾病統計〉，提到臺灣統計協會幹事長水科七三郎寫信給他，並且寄贈該會 2 月份的雜誌 1 冊，其中，收錄水科執筆的論文〈臺灣人口的死亡率增加〉；由於內田先前並不知道有此篇作品，對於未能引用而感到遺憾，不過加以閱讀之後，從方法上批評水科並未區分台灣人與日本人的不同情形，但也由於水科的來信，透露了高木醫學博士認為死亡人數增加的原因，在於討伐原住民的警官與人夫將瘧疾擴散到各地。⁶⁷

要之，臺灣研究並非內田銀藏的學術重心，但他卻留下多篇和臺灣有關的文章⁶⁸，雖然帶有「讀書討論」的性質，但其為學的精神確實有獨到之處。此外，就水科七三郎贈送作品予內田觀之，也顯示總督府對於外界如何評價其統計業務，可說極為重視。

（2）高野岩三郎的統計整合

⁶⁷ 內田銀藏，〈臺灣に於ける死亡率及疾病統計に就きて〉，《日本經濟史の研究》，頁 361～366。

⁶⁸ 茲舉二例加以說明：（1）內田銀藏，〈三百年前日本と臺灣との經濟的關係に就きて〉，《史林》第 2 卷 2 號（1917.4），頁 54～62。本文說明日人過去稱臺灣為 Takasago（或寫作高山國、高砂、塔加沙古等），其地名的演變經過為何。（2）《臺灣日日新報》，1917.4.11～12，〈隱元禪師〉（上）、（下）。將黃檗宗傳入日本的隱元禪師為中國福州人，生於明萬曆 20（1592）年，在 1654 年 63 歲時東渡日本傳道，1673 年以 82 歲高齡圓寂於萬福禪寺之松隱堂。內田在投稿當中抒發其對隱元事蹟的感想，尤其是新發現的《松隱堂經書目錄》，他也認為可以考慮黃檗宗是否在臺灣的宗教拓展上扮演一定的角色。

高野岩三郎於 1903 至 1920 年之間長期擔任東京帝大統計學講座。⁶⁹此外，他也是日本勞工運動的改革者，由於當時台灣的報紙也刊登日本國內的新聞，因此時人偶爾可以讀到相關的消息。⁷⁰高野於 1928 年 12 月成爲日本大眾黨的中央執行委員長⁷¹，翌年當他決定加入無產黨，報社還附了一張他的側面相。⁷²

高野對於台灣的人口調查，能以比較的眼光加以分析箇中意義，例如他曾經比較印度與台灣，而得出幾點特色。⁷³在人口動態統計方面，他曾經於 1914 年時探討臺灣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齡，得出近年來丈夫的平均結婚年齡爲 24 歲、妻子爲 19 歲，兩者相差 5 歲，前者低於日本國內男子約 3 歲，後者約低 4 歲；他認爲臺灣的氣候、風俗及簡單的經濟生活相互作用，以致台人比起日本國內提早了結婚的時間。⁷⁴高野對於台灣的出版品有很高的評價，1916 年他以台灣的出版速度爲榜樣，而請日本的內閣統計局能加緊出版的腳步，其謂：縱然無法如臺灣的人口動態出版品能在一年之後即將前一年的事實公諸於世（奢望如此快速或許無理），至少宜較現今提早出版日期，希望能進步到二年之後即可公開，並非過份要求。⁷⁵此外，高野曾寫道：在日本的殖

⁶⁹ 大內兵衛，〈高野岩三郎〉，《統計學辭典》（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59.3），頁 844。

⁷⁰ 茲舉二列說明之：（1）《臺灣日日新報》，1921.2.18，〈產業界に於ける階級爭鬥考察〉。高野說明其對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與勞工運動的關係之看法。（2）《臺灣日日新報》，1921.8.4~5，〈勞動運動に關する一考察〉（上）、（下）。本文介紹 1920 年 2 月成立的德國勞動代表委員制度。

⁷¹ 《臺灣日日新報》，1928.12.22，〈無產黨中間派合同の『日本大眾黨』結成〉、〈誕生までの事情〉、〈光榮ではあるが即諾は困難〉。

⁷² 《臺灣日日新報》，1929.1.12，〈高野博士の無產黨入り決意〉。

⁷³ （1）兩者的調查對象皆爲現住人口數目、（2）印度的調查時間早於英國的 4 月，而選在 2 月 26 日，原因是氣候炎熱，並且以滿月過後 3 天的月夜爲原則，一來可節省燈火的費用，二來配合印度人視滿月當天爲朝拜寺院的神聖日子；至於臺灣和日本之間則無此困擾，皆訂在 10 月 1 日進行、（3）調查項目在英國以男女、年齡、婚姻、職業爲主，印度則加上常用語、教育程度、種族等，臺灣可說與印度的情況相似，以及（4）印度由於識字率低而採「他記主義」（即非人民本身填記調查用紙），臺灣亦然。參見：氏著，〈臨時戶口調査ニ對スル所感〉，《臺灣統計協會雜誌》第 22 號（1907.3），頁 1~10。

⁷⁴ 高野岩三郎，〈本邦人口ノ平均婚姻年齡〉，《和田垣教授在職二十五年記念經濟論叢》（東京：有斐閣，1914.11），頁 762~826。

⁷⁵ 高野岩三郎，〈本邦統計書雜觀（二）〉，《國家學會雜誌》第 30 卷 5 號（東京：國家學會事務所，1916.5），頁 151~151。

民地當中，統計事業最爲完備者當屬臺灣，即使與日本相較，在某些方面反到有過之而無不及，……殷切期望 1915 年所進行的第二回戶口調查之出版品的完成，相信此一期待將不致於落空。⁷⁶

由於高野岩三郎爲統計方面的專家，長年又對台灣的動向保持關心，很自然成爲總督府所借重的者學。1917 年 12 月，總督府委託高野進行臨時戶口調查的結果事務。⁷⁷高野停留台灣期間，曾進行全島的旅行，並且發表幾場演說。⁷⁸1918 年 1 月 14 日，在台北的城南小學，高野提到臺灣每年的人口動態統計比日本國內值得稱道，除了讚許前二次的戶口調查之外，他也認爲由於對岸中國的統計調查不夠完備，因此學者如想透過臺灣來瞭解中國社會的情況，將會發現記述方面有不少可資利用之處。⁷⁹此外，高野岩三郎對於朝鮮也投注相當的心力，並且認爲臺灣經驗是朝鮮必須借鏡的對象。⁸⁰的確，朝鮮總督府於 1918 年 5 月在官房總務局之內新設統計課，同時也新成立國勢調查課。⁸¹同月下旬，該府決定採用台灣總督府屬土井薰太郎與久保真須勇，2 人於是被派往朝鮮，他們都擔任過 5 年以上的雇員，具有一定的統計調查經驗。⁸²

若比較高野岩三郎於 1924 與 1933 年整理的 2 份統計書目，即可

⁷⁶ 高野岩三郎，〈本邦統計書雜觀〉，《國家學會雜誌》第 30 卷第 12 號(1916.12)，頁。

⁷⁷ (1) 第 2762 冊《大正六年台灣總督府公類纂第十二卷》，第 69 號〈戶口調査ニ關スル事務ヲ囑託ス：高野岩三郎〉。(2) 第 2881 冊《大正七年台灣總督府公類纂第一卷》，第 144 號〈御用濟ニ付囑託ヲ解ク：高野岩三郎〉。

⁷⁸ (1) 雜報，〈高野博士來台及島內旅行日程〉，《台灣統計協會雜誌》第 144 號(1918.1)，頁 57。(2) 雜報，〈高野法學博士〉，《台灣統計協會雜誌》第 145 號(1918.2)，頁 59。

⁷⁹ 高野岩三郎，〈歐洲に於ける統計事業と本邦殊に臺灣に於ける統計事業〉，《臺灣教育》第 188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18.2)，頁 5~8。

⁸⁰ 彙報，〈高野博士の朝鮮國勢調査談〉，《統計學雜誌》第 401 號(1919.9)，頁 357。當時，高野岩三郎接受朝鮮國勢調查講習會之聘，人正搭乘關釜聯絡船「高麗丸」，他對《大阪朝日新聞》的訪問表示，朝鮮首度的嘗試能否得到預期的成績頗爲可疑，而已有兩次經驗的臺灣最初對工作人員來說也是相當困擾，因此必須一開始就覺悟有困難的存在，尤其是政治上的不安和朝鮮人民逐漸產生的民主思想，或將造成不少的阻礙。

⁸¹ ，〈朝鮮總督府統計の近況〉，《統計學雜誌》第 387 號(1918.7)，頁 277。

⁸² 第 2887 冊《大正七年台灣總督府公類纂第五卷》，第 54 號〈朝鮮總督府へ出向ヲ命ス：久保真須男、土井薰太郎〉。

了解高野因主持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得以充分利用該所的豐富典藏，而不斷更新內容。⁸³儘管高野的說明相當簡短而重複，仍然強調台灣的統計事業最為完備，不過其羅列官房調查課等單位所出版的年度刊物，無疑可提供該書的讀者作為參考之用。高野將相關的出版品分為一般、特別及其它三種，其中，部分並穿插簡短的解說，表 3-1-2 為整理前後 2 份書目之結果。由此可知，1933 年新增了不少殖產局、警務局及調查課的出版品。⁸⁴要之，日本的研究機構不僅有計畫收集台灣的相關出版品，並且透過公開的書目，使研究者能確實掌握台灣的情況。

表 3-1-2 高野岩三郎的台灣統計出版品書目

| 類別 | 書名 | 1924 年 | 1933 年 |
|----|--|--|---------|
| 一般 | 臺灣總督府統計書 | 為台灣整體的統計年鑑 | |
| | 臺灣統計摘要、臺灣統計一覽 | | |
| | 臺灣現勢要覽 | | |
| | 臺灣事情 | 為顯示臺灣統治的概況，附上許多統計，並嘗試加以說明的書籍 | |
| 特別 | 臺灣現住人口統計 | | |
| | 臺灣人口動態統計、臺灣人口動態統計記述報文 | | |
| | 台灣糖業統計 | | 列入殖產局一項 |
| | 臺灣外國貿易年表 | | |
| | 台灣總督府鐵道部年報 | | 缺 |
| | 臺灣犯罪統計 | | |
| 其他 | 1905 年 10 月第一次、1915 年 10 月第二次、1920 年 10 月第三次的戶口調查出版品 | 為有名的良好刊物，記述報文可讓人明確知道 1905 年以來 15 年間的人口與職業狀態之變化 | |
| 定期 | 臺灣糖業統計 | 缺 | |
| | 臺灣糖業要覽 | 缺 | |

⁸³ 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創立於 1919 年 2 月，高野岩三郎於 1930 年在改造社出版的《社會科學大辭典》曾撰文介紹其業務梗概。

⁸⁴ 任職於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的後藤貞治，在 1936 年由東京的叢文閣出版《本邦統計資料解說》一書，其中收錄高也的第 2 份書目，然而卻將「南支那及南洋調查書」誤作為殖產局隨時出版。

| | | | | |
|----|--|-------------------------|---|--------|
| 新增 | | 臺灣農業年報 | 缺 | 由殖產局出版 |
| | | 臺灣米穀要覽 | 缺 | |
| | | 臺灣商工統計 | 缺 | |
| | | 臺灣礦業統計 | 缺 | |
| | | 臺灣產業組合要覽 | 缺 | 由警務局出版 |
| | | 臺灣死因統計 | 缺 | |
| | | 蕃社戶口 | 缺 | |
| | | 理蕃概況 | 缺 | |
| 臨時 | | 臺灣蠻族慣習研究 | 缺 | |
| | | 南支那及南洋調查 | 缺 | 由調查課出版 |
| | | 農業基本調查書 | 缺 | 由殖產局出版 |
| | | 米生產費調查 | 缺 | |
| | | 臺灣農業發達の趨勢 | 缺 | |
| | | 臺灣糖業ノ發展カ經濟界ニ及 ホシタル影響 | 缺 | |
| | | 衛生調查書 | 缺 | 由警務局出版 |

資料來源：(1) 高野岩三郎，〈最近の本邦社會統計資料〉，《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パンフレット》第 16 冊(東京：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1924.8)，頁 40～42。(2) 高野岩三郎，〈本邦社會統計資料解説〉，《本邦社會統計論》(東京：改造社，1933.5)，頁 469～471。

(二) 犯罪統計

關於犯罪統計書，檢察官上內恒三郎曾投稿《台法月報》，表示翻讀 1909 度的台灣犯罪統計書後，認為刑量統計至今不曾見之於日本乃至各國，台灣可說是揭示此一統計的嚆矢，因而希望從事司法實務者能留意運用該項統計。⁸⁵1916 年，尾立茂投稿《台法月報》，對於犯罪統計書日益精緻加以肯定，認為若加以善用，可說是刑事政策執行上的暗夜明燈；其謂：總督府自 1905 年著手犯罪統計事業，創刊至 1908 年的 4 年間由警察本署負責，1909 年起轉由官房統計課接手；前期係草創時代，各年內容多少有所變更，在比較上頗感不便，而且犯罪統計失之過簡，終究非專業研究的資料；統計課繼承事業之後，由於方針確定、分類詳細及系統整理，而大為一改觀，成為純粹的專門統計

⁸⁵ 上內恒三郎，〈臺灣犯罪統計書に就て〉，出處同上，頁 307～308。

書。⁸⁶

尾立投稿《台法月報》的意義可再進一步申論。該報先後有幾位重要的核心人物，其中之一是創刊於 1907 年的《法院月報》主幹手島兵次郎，他在月報裡特闢「殖民法制之研究」，以供舊慣立法作參考用，該月報至 1911 年改名為《台法月報》，而手島則於 1916 年 10 月因病辭官。⁸⁷手島即將辭去《台法月報》的主幹一職時，水科七三郎在該報略抒所感，由此可知二人是在水科赴任當時透過吳文聰的介紹而認識，他認為手島有計畫改進台灣的司法統計，尤其使犯罪統計成了台灣的驕傲最為顯著⁸⁸。手島兵次郎後來於 1918 年 6 月逝世於故鄉廣島，享年 51 歲。⁸⁹木村匡於 1918 年 7 月的悼念文章裡，提到水科七三郎曾探視手島的病情，手島忍著苦痛還不忘議論台灣的司法和政治等問題。⁹⁰由此可見，儘管尾立茂將評論刊登於《台法月報》，事實上應可使從事統計工作的水科七三郎，乃至讓統計課的人員了解外界的觀感。

除了從事法律實務者的重視之外，犯罪統計更是學者探討犯罪現象的根據。⁹¹研究刑事法學的台北帝大文政學部副教授植松正，在 1942 年整理總督府出版的台灣犯罪統計，包括 1910 至 1935 年度，用以概觀台灣的犯罪現象；其探討結果認為台灣的犯罪人口比例頗高，1935 年受刑法有罪處罰者，全台約 3 萬人，亦即每 1 萬人有 56.2 人，至於日本國內則是 16.1 人，然而也必須考慮台灣的警察擁有較大的即決處分權力，尤其對於賭博，如果也像日本一樣是由檢察官加以起訴，則

⁸⁶ 尾立茂，〈臺灣犯罪統計 就〉，《台法月報》第 10 卷第 4 號（台北：台法月報發行所，1916.4），頁 46~50。

⁸⁷ 小松吉久，〈台法月報と其の主幹〉，《始政五十年台灣草創史》（台北：台灣平定記念會編纂部，1944.12），頁 310~316。

⁸⁸ 水科七三郎，〈述懷〉，《台法月報》第 10 卷 10 號（1916.10），頁 16。吳文聰為日本統計學研究的大家，水科於 1903 年來台前，因曾參與統計學社及東京統計協會的雜誌編纂，而和吳氏的交情頗深；吳氏並且為其介紹同鄉出身的鈴木宗言、中村是公及手島兵次郎，手島因此一直誤以為水科也是廣島縣人。本段趣事參見：水科七三郎，〈〉，《統計學雜誌》第 467 號（1925.5），頁 170。

⁸⁹ 彙報，〈手島元主幹の訃を悼む〉，《台法月報》第 12 卷 7 號（19.），頁 82~83。

⁹⁰ 木村匡，〈手島檢察官長（兵次郎）の死を悼む〉，《木村匡君口演集》（台北：小林清藏發行，1927.10），頁 95~97。

⁹¹ 關於日治時期台灣的犯罪情形和社會治安，可參閱：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台北：聯經，1999.4），頁 260~278。

換算之後可修正成台灣的刑法有罪受罰者為每 1 萬人有 42.2 人，但仍無法否定台灣有許多的刑事犯的事實，由此可見，兩地的道德水準有所差距；此外，植松也進行族群、性別、年齡、職業、地區及時間的比較。⁹²植松是否讀過當年尾立茂所寫的文章，吾人不得而知，然而他的研究可以說具體回應了尾立的期望，亦即未入寶山而空手回，以此直接資料深入研究犯罪的趨向，以求臺灣刑政的成敗得失及環境改善。

（三）台灣事情

出版品不僅能見證總督府施政的成績，也是對外宣傳的絕佳途徑。1922 年初，《臺灣日日新報》一面批評日本國內對臺灣的了解不夠充分，謬見仍深植人心，臺灣常被聯想為恐怖的地方：酷熱難耐、「生蕃」戮首及毒蛇成群，尤其是各種傳染病的淵藪。該文於是推薦欲知臺灣過去、現在及未來詳情不可錯過的 3 種參考書，其中之一即是《台灣事情》，介紹文字表示透過本書即可得知目前臺灣各方面行政的組織與現況，袖珍版 765 頁，定價僅 2 圓，總督府委由台北市書店新高堂經銷。⁹³

日人秋守常太郎認為台灣是官吏萬能主義的地方，而且一旦得罪了他們，就什麼事也別想做，原因之一在於台灣是殖民地，另一主因則是官方強勢的指導和獎勵，以及許可事項特多的緣故；他表示自己來台旅行之前，即請臺灣總督府寄送該府發行的書籍《台灣事情》，然而，坐船途中加以閱讀時，驚覺臺灣的一切產業和人事多受到官方的保護，除了五大專賣之外，其它須經同意的準專賣也所在多有；由是

⁹² 植松正，〈台灣犯罪現象の概観〉，《民俗台灣》第 2 卷 12 號（1942.12），頁 2~7。植松後來在 1969 年成爲一橋大學的名譽教授，最終在 1999 年過世，享年 93 歲，爲他追悼的人是經常與他站在反對立場、卻仍保持友好關係的團藤重光。參閱：氏著，〈植松正博士のご逝去を悼む〉，《犯罪學雜誌》第 65 卷 2 號（東京：日本犯罪學會，1999.4），頁 47~50。此外，《一橋論叢》曾在 1969 年刊登植松的著作目錄，惟遺漏了植松在台時期的作品。

⁹³ 《臺灣日日新報》，1922.1.23，〈真に臺灣を知る人の必讀す可き三大書〉。

主張廢除各種利權，使日人和台人彼此平等，以及產業的自由化。⁹⁴

因此，統計固然是總督府施政的重要憑藉與成績的展現，但是利用的人很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讀，而最大的危險莫過於被殖民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茲以林呈祿為例說明之。林氏擁有深厚的統計學養，他曾於 1910 年修完台灣總督府統計講習會的課程，並升任總督府法院書記，成為台北地方法院的統計主務，後來前往明治大學唸書；1917 年 2 月就任中華民國湖南省立政治研究所教授，並兼任該省統計講習所主任教員，隔年 7 月辭職，轉而投入台灣的政治運動等。⁹⁵

在《台灣青年》的創刊號上，林氏認為第一次大戰之後，「弱者」必須覺醒奮鬥，世界也會從黑暗、權力、階級、束縛，而朝向光明、正義、平等、自由去前進，當最終的勝利歸於新思想的一天，即是新文化完成的時候；他相信台灣青年的任務在於努力啟發台灣的文化，同時也要處在日、漢兩民族的中間而負起東洋永久和平之責。不過，台灣人有無機會認識大環境的變遷呢？他以為「證據」在於教育的情況，並且援引 1915 年 10 月第二次台灣臨時戶口調查的結果加以立論，表示每 100 人當中有 97.7 人不懂假名，由是批評當局未能提供充分的教育設施。⁹⁶

當日本的其它官廳在舉辦有關統計的活動時，台灣總督府也是聯絡的對象之一。例如，樺太廳為了在 1929 年夏天召開統計講習會之際，網羅有關統計的資料，以展覽會的方式公開讓人參考，於是請求各方能在 7 月底前惠予寄贈下列圖書：(一)最近刊行的統計書籍、(二)統計圖表、(三)統計事務處理的各種規定、(四)其它參考資料；其所請求的對象為中央的內閣、各省、地方府縣，以及日本的各個殖民地，

⁹⁴ 秋守常太郎，《臺灣旅行》（發行地不詳，1941.7），頁 75~80。

⁹⁵ 興南新聞社（編），《台灣人士鑑》昭和 18 年刊本（東京：湘南堂，1986.6），頁 325。關於林呈祿的生平介紹，另可參閱：王泰升，〈「鬱卒」的第一代台灣法律人：林呈祿〉，《月旦法學雜誌》第 78 期（台北：月旦法學雜誌社，2001.11），頁 73~88。

⁹⁶ 林呈祿，〈新時代に處する台灣青年の覺悟〉，《台灣青年》第 1 卷 1 號（東京：台灣青年雜誌社，1920.7），頁 29~40。

包括北海道廳、朝鮮總督府、台灣總督府及南洋廳。⁹⁷又如，富山縣廳在 1935 年 6 月發文給各省局、各個殖民地、地方政府、滿洲國調查局、柳澤統計研究所，以及日本海員掖濟會，希望能在 7 月初出借有關統計等國勢相關的圖表、記錄及海報，供其在 7 月中主辦統計大會與展覽會。⁹⁸

1895 年 12 月時，內閣統計課爲了第十回統計摘要的編纂，因而照會陸軍省希望可讓出台灣全島百萬分之一的地圖一份，惟因參謀本部已無該課想要的比例圖，僅能提供四十萬分一的地圖。⁹⁹

（四）總督府統計書

《國民新聞》曾刊登〈帝國的殖民政策〉一文，認爲日本與美國同被歐洲政治家稱爲世界的新勢力，原因除了國內制度的進步、技能的發展、資源的增加及國防的鞏固外，對外則握緊世上共通的帝國主義，其標誌即是在南邊取得新版圖台灣，至於北邊就是固守朝鮮的勢力範圍，因此不妨說統治台灣的成果是日本作爲第一流國家的畢業考試；全篇係針對「公平的觀察者」倫敦的《泰晤士報》之評論所發，英國人以數字仔細說明日本的治績，而該文指出若想更精密加以考究，可徵諸已經出版 6 回的台灣總督府統計書。¹⁰⁰

⁹⁷ 《昭和 4 年海軍省公文備考》，〈展覽會出品物送付の件〉。由此文件可知，海軍省方面一共提供了四種資料。（）

⁹⁸ 《外務省記錄》I 門 1 類，〈本邦展覽會關係雜件 第一卷 28・国勢展覽會〉。由此文件可知，外務省的回覆表示，將寄贈 7 種有關日本貿易狀況的圖表，共計 14 份。（）

⁹⁹ 《陸軍省壺大日記》，〈台灣全島圖讓受ケの件〉。（）

¹⁰⁰ 國民新聞社，〈帝國の殖民政策〉，《帝國政策と台灣》（東京：民友社，

《台灣慣習記事》的書評可以讓人清楚了解當時對統計書評價的變化。1904年，署名方計子寫下對第6統計書的感想，認為多了25個表格可以增加25項新的知識，但也摘出6處的疑問。¹⁰¹到了第7統計書問世之後，該刊的介紹指出又增加56個表，內容上也明顯改善，減少向來因為「？」而使讀者失望的缺點，亦是本書進步的表徵；當然，統計書也受到了批評，例如「河川舟路」一表不以河川為主體，對未曾進行踏查的人來說猶如置身五里霧中。¹⁰²到了第9統計書出版後，書評進而認為如果要編輯民政實施以來的10年統治小史，可以此書的調查作為一個段落，文末並向負責的水科七三郎致謝。¹⁰³

由上反映，時人對統計書在方法上的改進，以及對能帶給地理研究的便利之期待。日本國內也可見類似的觀點，1909年的一篇新書介紹即謂：吾人在研究台灣的地理時，很遺憾除了台灣總督府統計書之外，少有涉及全體的資料，如今有了《台灣統治綜覽》，得以撥雲見日。¹⁰⁴此外，它也是推估台灣人口的工具書¹⁰⁵，以及研究臺灣資本主義化問題的一項參考資料。¹⁰⁶無論如何，透過贈送¹⁰⁷，或是販售¹⁰⁸，統計書無疑是臺灣統計成果有效流通的重要管道。

1905.1)，頁41~54。

¹⁰¹ 參見：《台灣慣習記事》第4卷8號（1904.8），頁60~64。

¹⁰² 參見：《台灣慣習記事》第5卷9號（1905.9），頁46~47。

¹⁰³ 參見：《台灣慣習記事》第7卷7號（1907.7），頁63~65。

¹⁰⁴ 豬間，〈台灣統治綜覽、台灣寫真帖〉，《地學雜誌》第243號（東京：地理學協會，1909.3），頁225~227。

¹⁰⁵ 1910年8月的一則報導謂台灣人的增殖著實令人吃驚，因為根據第十二統計書加以試算，1908年底的人口總計325萬餘人，而按一定的倍率作推衍，則百年之後台灣的人口將增加四倍，亦即會超過1280萬人。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10.8.19，〈百年後之本島人口〉。

¹⁰⁶ 宋明哲，〈臺灣社會經濟史研究の現況〉，《歷史科學》第3卷9號（東京：白揚社，1934.8），頁80。

¹⁰⁷ 例如，木村增太郎在1912年從上海寄信給水科七三郎，感謝寄送第14.統計書。參見：雜報，〈木村法學士ノ端信〉，《臺灣統計協會雜誌》第76號（1912.5），頁66~67。

¹⁰⁸ 以1919年的第23統計書為例，介紹文字略謂：售價6圓，島內運費為27錢；網羅了臺灣各種的統計，46倍版、頁數約8百的大冊；近來島內外的欲購人數甚多，然因總督府對於本數設有限制，故而未能回應各方所需，但《臺灣時報》發行所已經得到翻印、發行許可，有意買者請迅速洽詢該所預約」。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1.3.25，〈臺灣統計書〉。

最後，關於台灣的統計出版品流通日本國內機關的情形，茲以陸軍省等單位為例作一探討。資料顯示，1896年2月總督府學務部即向陸軍省請求該省出版的圖書與報告，以作為「台灣教育和學問上的參考」。¹⁰⁹由此可見二者之間，除了軍事之外，很早便在出版品上建立關係。就調查課的統計出版品而言，陸軍省於1937年1月收到該課寄來的三冊昭和十一年版《臺灣事情》，其後分別由戰備課、軍務課及衣糧課各保管一本。¹¹⁰

在統計書方面，調查課於1936年4月寄給該省三冊《第三十八統計書》，先後由動員課、統制課及閱覽室各保管一本；在1941年6月時，企劃部寄出《第四十三統計書》；翌年8月依舊使該省能收到三冊《第四十四統計書》。¹¹¹亦即官房定期將新書寄達陸軍省。有時，官房或許基於該省的需求，而送去過期的出版品；但無論原因如何，也顯示總督府能適時提供相關的成果，作為參考之用。¹¹²此外，1943年官房情報課寄出昭和十八（1943）年版《台灣事情》給國土局之外，並請對方務必於1943年10月底前提供相關資料，以利昭和十九（1944）年版《台灣事情》之編纂作業。¹¹³11月，情報課並再度發文給國土局，請求調查1942年4月以後出版及印刷分送的各種書籍等之概況。¹¹⁴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總督府寄出的書籍由於性質有別，重要性亦

¹⁰⁹ 該案經參謀本部同意今後可在沒有問題的情況之下予以寄送。參見：《陸軍省壹大日記》，〈當省出版の圖書等請求の件〉。（資料來自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¹¹⁰ 《陸軍省大日記乙輯》，〈「昭和11年版台灣事情」の件〉。（出處同上）

¹¹¹ 《陸軍省大日記乙輯》，〈台灣總督府第38統計書の件〉、《陸軍省壹大日記》，〈總督府第四十三統計書に關する件〉、〈總督府統計書送付の件〉。（出處同上）

¹¹² 例如，官房文書課在1939年8月寄出一部昭和六年度《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1941年7月寄出昭和十一年度，1942年9月則寄出昭和十四年度（第45編），其後皆由陸軍省的閱覽室加以保管。從時間上來看，上述三次的寄送均非最新的出版品。參見：《陸軍省壹大日記》，〈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送附の件〉、〈昭和十一年分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第四十二編送付の件〉、〈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一部送付の件〉。（出處同上）

¹¹³ 第11497冊《昭和十八年一月起雜書》，第61號〈昭和十九年版臺灣事情編纂ニ關スル件〉。

¹¹⁴ 第11497冊《昭和十八年一月起雜書》，第46號〈官廳關係出版物調ニ關スル件〉。

有所不同。例如 1932 年 5 月，拓務大臣官房文書課詢問海軍大臣官房，是否可以寄贈第三十三台灣總督府統計書與第二十六台灣統計摘要各一冊給駐日法國大使館；由於海軍省軍務局認為前者的內容詳細，希望暫勿寄贈，並且在附箋紙中提到陸軍也持同樣的意見，至於後者則無任何的問題。¹¹⁵

第二節 調查業務與評價

第二次大戰期間，不少人流露對後藤新平的緬懷，連帶也影響對其所作作為的評價。1942 年，台北帝大教授中村哲撰文高度肯定已故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認為後藤在統治臺灣時尤致力於各國殖民地成果的比較研究，並投注總督府力量翻譯相關的外國書籍，因此，如果要蒐羅關於南方的資料，可知大部分還是後藤時代的遺留；而且，當時臺灣的調查機關比中央政府進步，但過後此種事業便中斷了，令人感到惋惜不已。¹¹⁶中村的感嘆不只一次，在別的文章中也寫道：大東亞各地域尚未編入日本帝國的勢力圈之前，臺灣位居南方調查的第一線，但隨著東亞研究所、東亞經濟調查局及太平洋協會等劃分地域著手實地調查，臺灣遂有必要調整任務朝向華南社會的研究。¹¹⁷

又如，1943 年佐多長春檢討南方森林與資源作戰，認為調查的方向有二，即文獻探究的先行和實地了解的跟進，前者仍有許多事情可做，並且應轉化西歐人長期的經驗。佐多有此看法，實與後藤新平的

¹¹⁵ 《昭和 7 年海軍省公文備考》，〈在京佛国大使館へ印刷物寄贈方の件〉。（出處同上）

¹¹⁶ 中村對後藤的想像是「假設他早生十年，就能扮演維新功臣而發揮政治能力，又若讓他多活十年，則今日南方國策的世界性企畫將由他付諸實現」。參見：氏著，〈新日本と後藤新平〉，《臺灣時報》第 271 號（1942.7），頁 30～35。在該期的雜誌當中，另有台北高等學校教授鹽見薰所寫的〈後藤新平について〉，他在文中引用二葉亭四迷的《入露記》，寫道後藤是一位「理想家兼實際家」。

¹¹⁷ 中村哲，〈南支那の研究と臺灣〉，《臺灣公論》（台北：台灣公論社，1943.1），頁 14～16。

「舊慣調查」有關，略謂：雖僅限於台灣的文政方面，但伯爵（指後藤）毅然加以採行的理念，同樣也是其從事台灣資源與經濟開發之根本。因此，佐多主張實際的考察不妨留待來日。¹¹⁸

當時，台灣人陳逢源亦認為兒玉總督、後藤長官時代的大規模舊慣調查之成果是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聘請日本國內知名的學者，出版龐大的報告書，由如此遠大的氣魄可知前人的眼光絕非平凡，但在上位的官吏有幾人曾瀏覽過呢？細窺陳氏的用意是在借古諷今，即皇民化運動若不深究臺灣這塊土壤，則斷無花開繁盛的道理，因此，總督府至少得先完成一部面面俱到的臺灣史。¹¹⁹

陳逢源的看法點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亦即調查報告究竟受到多少的注意。事實上，「後」後藤新平時代，總督府一直持續對海外各國殖民地乃至先進國家進行調查。1922年1月，《臺灣日日新報》刊出社論〈經濟發展策略與產業調查〉，認為長久以來華南和東南亞被當作是台灣可以發展經濟的地方，惟仍不脫研究調查的範圍，還未成為實際活動的場域。不過，該文也指出日本治台以來，以台灣為中心向外發展，在各種遠大的抱負之下，確實也作了縱橫周密的調查研究。¹²⁰時人工藤新平於1931年亦指出，總督府調查課與殖產局等官方出版品，發表不少珍貴的調查資料及研究成果。¹²¹

武內貞義在《臺灣》一書裡，寫到關於政府出版品「包括中央研究所、殖產局及內務局等官廳出版的研究調查報告書、統計書等，皆是頗為寶貴的資料，按此可追索台灣現今文化的來時路，而將來的進展也能從中推知；不過，由於係官方出版品的緣故，無法向一般社會分發，誠是一項遺憾」¹²²。

¹¹⁸ 佐多長春，〈林業・林產上より見たる南方調査の課題〉，《臺灣の山林》第201號（台北：社團法人台灣山林會，1943.1），頁3～9。

¹¹⁹ 陳逢源，《雨窗墨滴》（台北：臺灣藝術社，1942.8），頁131～133。

¹²⁰ 《臺灣日日新報》，1922.1.12，〈經濟發展策と産業調査〉。

¹²¹ 工藤新平，〈臺灣出版物の種々相〉，《臺灣警察時報》第31號（台北：台灣警察協會，1931），頁6。

¹²² 武內貞義，《臺灣》（台北：新高堂，1927.11），頁160～161。

調查課最主要的業務為南支南洋等海外的制度與經濟調查，該項調查持續了十餘年間，1935年9月因規程改正而移交給新設的外事課。¹²³調查課除了出版調查報告書，也編輯數種刊物，包括外事週報、講演錄、統計週報、內外情報、海外定期刊行物重要記事目錄及南洋年鑑。其整體的情形，如表 3-2-1 所示。

表 3-2-1 調查課的調查業務一覽

| 項目 | 說明 | 年度 |
|-----------------|---|---------|
| 南支南洋等海外的制度與經濟調查 | 在調查完成之後，將其印刷以提供事務上作參考 | 1918、19 |
| | 西文出版品、來自當地的通信或派遣人員的報告，經覆查之後，將其印刷以提供府內各單位與相關官方和民間人士作為參考 | 1920 以降 |
| 創刊外事週報 | 抄譯外國報紙與雜誌當中值得參考的報導，將其印刷以提供各界作為參考（與外事課共同編輯） | 1920 |
| 創刊講演錄 | 不時委託考察或遊歷華南、東南亞及歐美各國的人士舉行演講會，並將速記訂正後加以謄寫，而提供府內各單位作為參考 | 1920、21 |
| | 將速記刊登於台灣時報 | 1922 以降 |
| 創刊統計週報 | 分析或綜合調查統計的數字，使能一目瞭然，又為更迅速傳達出去，將其印刷後分送適當的官方和民間人士 | 1920 |
| 內外情報 | 合併外事週報與統計週報，並改名為內外情報（與外事課共同出版） | 1921、22 |
| | 將書籍、報紙及雜誌等當中對瞭解華南與東南亞各地現況有必要性的報導揭出，而為提供相關政府單位與在華南和東南亞經營各種事業的日人（個人或企業）作參考，每十天印刷一次並將其分送出去 | 1923、24 |

¹²³ 臺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1935年，頁137。

| | | |
|-----------------|--|---------|
| | 向來每十天即刊行一次，惟自 1925 年 11 月號起與臺灣時報合刊，改由該報發行所出版 | 1925、26 |
| | 改名為支那及南洋情報，作法則不變 | 1927 以降 |
| | 南支那及南洋情報作為台灣時報的附錄 | 1931 以降 |
| 製作海外定期刊行物重要記事目錄 | 每月一次製作中國、東南亞及歐美各國的報紙與雜誌當中重要報導的目錄，並分送總督府各單位等 | 1921、22 |
| | 另外分送給全國經濟調查機關聯合會等 | 1923 以降 |
| | 支那南洋等海外重要記事索引與臺灣時報合刊，並由該報發行所出版 | 1927 以降 |
| | 南支那及南洋關係重要記事索引與南支那及南洋情報合刊 | 1931 以降 |
| 創刊南洋年鑑 | 為盡量廣泛介紹東南亞的情況而編纂，由南洋協會臺灣支部出版及發售 | 1929 |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1918~1938 年度。

由上表可知，調查課的各項調查業務，包括收集資訊、舉辦演講及製作索引等，後來都交由台灣時報發行所出版，由於該雜誌被認為是總督府的機關刊物，因此，調查課的成果能有效讓相關的單位作為參考。

（一）出版品的流通

調查課的成果同樣受到矚目。1926 年 9 月，日本外務省主辦第一次南洋貿易會議，參加者約有一百五十人，為期十天，議題分成七個部會。台灣總督府派遣幾位官員列席，分別是殖產局長片山三郎、遞信部長深川繁治、特產課長中瀨拙夫、金融課長中田榮次郎、統計官原口竹次郎及技師色部米作。根據永嶺一虎的報導，16 日下午在第二回企業與投資部會上，片山局長先是說明台灣和南洋的特殊關係，並以確實的根據來論述各種事業的潛力，進而指出企業援助的方法，最後更強調希望將台灣列入考量；其次，官房調查課完成的企業參考資

料，發給了該部會的出席者，而受到非常的好評，外務當局和駐外使館的人都認為總督府的調查報告優於其他團體所提出者，台灣的代表們因此顯得頗為驕傲。¹²⁴

關於調查課編纂的南支南洋調查出版品，如何流通日本國內，首先，可就全國經濟調查機關聯合會加以觀察。該會創立於 1920 年，為日本全國各政府單位、學校、銀行及公司所屬經濟調查機關的聯絡與合作之機關。¹²⁵聯合會的事務所設於東京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之內，1921 年台灣總督府以調查課長東鄉實為代表者而加入其中。¹²⁶該會細則第四條規定，各加入會員將完成的調查及翻譯文書的目錄向本部報告之同時，應寄送 1 冊該文書或謄寫給理事長及支部長所在的機關。¹²⁷根據 1932 年的調查，該會擁有 126 個會員。¹²⁸到了 1937 年 4 月，該會共由 137 個機關組成，其中，在關西支部方面，台北帝大的代表者為文政學部經濟學研究室的楠井隆三，而台北高商則是切田太郎。¹²⁹

因此，調查課的出版品透過此一機制，定期寄送給全國經濟調查機關聯合會，按理也能獲得相對的回饋。資料顯示，調查課對於全國

¹²⁴ 永嶺一虎，〈外務省主催第一回南洋貿易會議概況〉，《台灣時報》□（1926.11），頁 17~31。由本文可知，農林省日後請求了二十冊，而南洋栽培聯合會的代表也作出同樣的要求。

¹²⁵ 該會成立的旨趣聲明如下文：一般而言，隨著國運昌隆與國力增進，國家經濟界的各種問題愈形錯綜複雜，若仍抱持以往之獨斷，畢竟難以究明事實的真相而樹立適切的對策。因此，近來我國（日本）看出經濟調查的重要性，遂見各方有設立機關之舉……（然而）各機關的調查徒然辛勞於無意義的重複與矛盾。藉由合作方能克盡全功，但始終不然……吾人值此多事之秋，當盡其所能一致合作，便利資料的蒐集，以謀求調查的振興。參見：東亞經濟研究所調查部，〈全國經濟調查機關聯合會の組織と其の事業〉，《山口商學雜誌》第 8 卷 2 號（：山口高等商業學校商學會，1937.6），頁～。

¹²⁶ 時報，〈全國經濟調查機關聯合會〉，《台灣時報》（1921.9），頁 6。

¹²⁷ 全國經濟調查機關聯合會，《全國經濟調查機關聯合會趣旨、規約、細則、會員名簿》（台北：台灣大學圖書館藏，1932.4），頁 5、20。1932 年當時，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的代表者為原口竹次郎

¹²⁸ 資源局，《本邦主要經濟團體調查》（1933.12），未編頁碼。

¹²⁹ 東亞經濟研究所調查部，〈全國經濟調查機關聯合會の組織と其の事業〉，頁～。

經濟調查機關聯合會的業務還提供其它的協助。例如，該會於 1936 年主辦台灣與華南考察團，並委託會員之一的官房調查課代為安排在台的相关事宜；一行約有二十人，預計 4 月 11 日抵台，22 日從高雄出發前往華南，5 月 6 日回到長崎。¹³⁰

爲了具體了解調查報告書的流通情形，可以《汕頭帝國領事館管內事情》一書爲例稍作說明。1922 年 9 月，調查課課長東鄉實針對本書的分送對象與冊數，向外務省通商局監理課長加以通報，由此可知共計三百餘本，分別送給（1）島內官廳方面，包括總督府各個單位、高商等學校、圖書館、中央研究所、地方政府與所屬學校、陸軍與海軍；（2）島內民間方面，包括石坂文庫等藏書機構、《台灣時報》等報社、台北商工會等團體、台灣銀行等金融行業、各製糖會社、大阪商船會社基隆支店等船商、台灣電力等大型公司、商品陳列館、博物館；（3）島外官廳方面，包括內閣以降的政府單位、朝鮮總督府、關東廳、台灣總督府東京辦事處、東京帝大等學校、重要的圖書館、亞洲各地的公使館與領事館，以及全國經濟調查機關聯合會的會員等；其中以汕頭領事館十冊爲最多。¹³¹

（二）調查資訊的分享

官房調查課認爲日本國內相關單位的成果，對其業務具有參考價值時，也會透過發文加以請求。例如 1923 年 7 月調查課發文給外務省情報部，表示該部 6 月寄送總督府文書課有關 1922 年底中國的報紙和通訊調查，以及歷年來的出版品，對於調查課而言是極爲重要的參考資料，如果仍有剩餘，懇請再次贈送；其後，情報部由於 1918 年之前的部分已經無剩，乃提供 1919 至 1922 年，共計四冊。同時，官房文書課也順利向該部索取中國的報紙通訊調查二冊，以及「支那現任職

¹³⁰ 《臺灣日日新報》，1936.3.18，〈台灣南支の視察團四月十一日に來台〉。

¹³¹ 《外務省記錄》，〈7 大正 11 年 3 月 29 日から大正 11 年 12 月 23 日〉。（資料來自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員表」五冊。¹³²再如，該課認為外務省情報部於 1926 年初所發行的「列國內閣閣員一覽表」極具參考價值，於是 4 月向該部提出分送剩餘冊數的請求；其後，該部除應允寄出二冊之外，並告知已經改組或有更迭的幾個國家。¹³³

除了正式列在年度成績的業務之外，從報紙的記載可知調查課將獲得的訊息提供給外界，使其能掌握相關的動態。以茶業為例，調查課於 1919 年 3 月翻譯倫敦泰晤士通信員寄給《貿易附錄》有關印度茶業的文章；《臺灣日日新報》認為此文具有參考價值，於是徵求同意之後加以刊登；該文指出印度的茶業在過去五十年來有很大的進步，原本對外出口五百萬磅，1916 年至 1917 年間已增為三億萬磅，其中，八成運往英國；此外，並介紹歐洲各國人民對茶的消費情形、印度茶業的生產、課稅及製茶機器之狀況。¹³⁴

又如 1931 年 6 月，根據新近送達調查課的資訊，報紙登載法國在中南半島經營的茶業引起各方的矚目，原因在於總督府從 1925 年以來進行研究與獎勵，因而能出口到歐洲市場上（倫敦與阿姆斯特丹），並博得好評；該文由是未雨綢繆認為將會帶給台茶一定程度的影響。¹³⁵此外，爪哇的一位茶園經理於 1933 年 11 月在總督府演講有關台、印兩地的茶業，主辦單位為南洋協會台灣支部，出席者約七十位，翻譯人為調查課的山岸祐一。¹³⁶

此外，官房調查課的情報也透過有關單位的傳送，而使日本國內的人士能獲得南方的消息。茲以派駐在台北的井上海軍武官為例說明之。1933 年 4 月，井上發給海軍省軍務局長一份文件，內容是調查課的支那及南洋情報特報第二號，為摘譯自 3 月 20 日的菲律賓報紙刊載有關朝鮮獨立之報導，該文由合同通信社的通信員史都華·布朗

¹³² 《外務省記録》，〈新聞雜誌ニ關スル調査雜件ノ支那ノ部 第五卷〉。（出處同上）

¹³³ 《外務省記録》，〈1 大正 15 年 3 月から大正 15 年 4 月（諸外國内政關係雜纂 第一卷）〉。（出處同上）

¹³⁴ 《臺灣日日新報》，1919.3.8，〈印度の茶業〉。

¹³⁵ 《臺灣日日新報》，1931.6.20，〈印度支那茶歐洲市場に進出〉。

¹³⁶ 《臺灣日日新報》，1933.11.8~9，〈外人の眼に映じた台灣の茶業〉。

(Stewart Brown) 執筆，內容大意為 2300 萬朝鮮人反對日本的統治，於是向日內瓦的國際聯盟提出如下的主張：若不正視並處理朝鮮問題，將永遠無法解決滿洲事變；朝鮮共和國臨時政府總統李承晚並指出，朝鮮人認為日本的權威不外乎軍隊的力量，證明了同化政策歸於失敗，因此希望國際聯盟能聽見朝鮮人在暴政之下的呼叫。¹³⁷

隔月，井上又發文給海軍省軍務局長，將調查課有關日本和法國之間針對中南半島的締結的通商協定作一報告，其資訊海防日本人會會長橫山正修的答覆，略謂：1932 年 5 月成立，同年 8 月實施的關稅協定，對日本的幾種物品而言，將可拓展銷路，但棉系等類則仍受關稅的限制，因此未來應考慮交涉最惠國的待遇；此外，該情報也提及法方所欲課徵的匯率差額補償之付加稅，可望近期內實現，如此一來，日本產品無疑會遭受至大的打擊。¹³⁸

(三) 調查成果的評價

關於調查課的調查出版品究竟獲得何種評價，可從幾方面加以探討，包括總督府內部的想法、學者的看法、企業界的觀感，以及相關機構的回應。

1920 年代，台灣企業界面對經濟問題，認為設立設置經濟調查會，才是解決各種問題的辦法。¹³⁹1923 年 11 月，三井物產會社台北支店長津久井誠一郎在全島實業大會建議總督府內部設置經濟調查機關，並且在華南和東南亞的重要都市設立商務官，以避免因領事更迭

¹³⁷ 該報告也送給軍令部第三班長與馬要參謀長。參見：《海軍省公文備考》，〈第 38 號 8・4・26 朝鮮獨立に關する比島紙記事に關する件〉。(資料來自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¹³⁸ 該報告也送給軍令部第三班長。參見：《海軍省公文備考》，〈第 42 號 8・5・16 印度支那に關する日仏通商協定締結に依る影響及其の將來の件〉。(資料來自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¹³⁹ 《台灣日日新報》，1924.10.10，〈南支南洋經濟調查會〉。

而造成調查研究上的損失。¹⁴⁰

1925年1月，津久井投稿《台政新報》新年號，論及臺灣經濟界的現狀，略謂：近二、三年農產豐隆，米糖等皆有顯著的增加，但不過是每年一時的現象而已，若從臺灣產業的大局來看，如今正是轉向集約經營之時，此亦為有識之士所再三議論者；尤其最近高唱南支南洋的問題，筆者對其研究與策略表示過些許意見，惟社會普遍仍未感覺有何必要，誠為遺憾之處，在去年於高雄的實業大會曾提倡針對南支南洋設立商務官，進而今年在基隆的實業大會也大聲提議急須設置經濟調查會，然有謂圖外必先安內，惟眼光非常短視；臺灣對於南進的使命雖說官民都在提倡，卻甚少設施可觀者，除上述的內部優先之外，臺灣的資本家或實業家當中精通此一方面者極少，因此認真討論問題者亦少，想必少有精讀總督府調查課所編纂分發的珍貴資料，而多是束之高閣，故劍及不能履及；百聞不如一見，為讓他們親自視察此地，應早日設立官民經濟調查會，並因地派駐商務官，使兩者相得益彰以達成吾人之目的；又鑑於台人與南洋華僑的歷史關係，應了解此一特殊性並善加利用，則臺灣與南洋之間的經濟聯繫將日趨緊密。¹⁴¹

津久井誠一郎在1928年回東京本店任職，台北支店長的後任由原台南支店長、目前為長崎支店長的小寺新一接手，代理台北支店長的井上知博轉任台南支店長，而台南支店長六戶千穎則轉任長崎支店長。¹⁴²對於津久井的離去，輿論充滿了不捨之情，在記者所作的告別訪問當中，他也不忘提醒要研究南支南洋與日月潭水電等緊急問題。¹⁴³

儘管如此，學者則給予南支那及南洋調查書很高的評價。1937年，青木繁撰文討論熱帶植物生產，行文當中特別引述總督府官房調查課出版的「南支及南洋調查」第159輯，由隈川八郎撰寫的《作為國策之南洋移民》一書，認為雖然是僅有11頁的小冊，其要旨卻深值

¹⁴⁰ 津久井誠一郎，〈南支南洋に商務官新設の提唱〉，《台灣時報》（1923.12），頁12～23。

¹⁴¹ 津久井誠一郎，《在台七年》（台北：作者發行，1927），頁237～244。

¹⁴² 《臺灣日日新報》，1928.7.6，〈三井の津久井誠一郎氏東京本店へ榮轉〉。

¹⁴³ 《臺灣日日新報》，1928.7.6，〈惜まるる津久井氏〉。

得吾人敬佩；青木並評斷總督官房調查課在調查上的使命重大，且迄今的調查之細密周到任誰都會佩服，亦即南進政策的基礎工作可說相當充分。¹⁴⁴此外，在台北帝大教授移川子之藏的藏書當中，關於南洋的部分亦有調查報告書第 38 輯《菲律賓原住民地域之行政》、第 58 輯《英國北婆羅洲事情》，第 67 輯《荷蘭新幾內亞之研究》，以及《南支那及南洋調查書目錄》。¹⁴⁵

總督府圖書館長山中樵曾撰文指出，在日本內部出版最多南洋相關資料的臺灣總督府和南洋協會，前者由官房調查課出版南支那及南洋調查書，此套叢書的內容橫跨法制、經濟、產業、交通等方面，包括派遣專家調查所完成的報告書及翻譯書等，大體而言其廣度雖有限，然具備深度者居多；在針對特定事項進行研究時，多是必讀之書；雖然全是非賣品，但在本館及島內的主要圖書館皆有收藏，又為便利讀者，可透過南洋協會臺灣支部，想要讀的人無論何時都能方便閱讀。

146

《台灣·南支·南洋小冊》是專門針對台灣的政治和經濟作批判言論的刊物，1926 年 9 月曾簡要臚列「南方文獻書目」，內容為官房調查課及南洋協會的出版品，編者希望藉此有助於南方研究¹⁴⁷。然而，隔月發行的小冊先是檢討 9 月在東京由政府所召開的南洋貿易會議，認為在向印度及南洋的出口金融上，僅靠普通的外匯銀行並不足夠，應另設能保證票據信用的組織，畢竟日本對兩地的出口於 1925 年已達約 4 億圓左右。最後，該文將筆鋒一轉談及台灣的南方調查，指出總

¹⁴⁴ 青木繁，〈熱帶植產學概論〉，《臺灣の山林》第 136 號（：，1937.8），頁 1～19。青木繁是東北帝大林學實科 1916 年的畢業生，同年 11 月來台任職於專賣局腦務課，1917 年底進入軍中 1 年，然後又回到專賣局工作到 1921 年 3 月，接著在台北州勸業課服務至 1923 年 6 月，此後在高等農林學校執教，1932 年 5 月從台北帝大附屬農林專門部副教授升為教授，由著作目錄可以看出專長在造林學方面，主要發表於《臺灣山林會報》。參見：第 10070 冊《昭和七年四、五、六月高等官進退原議》，第 89 號〈任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教授：青木繁〉。

¹⁴⁵ 《國立台灣大學收購故移川子之藏教授私人藏書目錄》（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藏，1951.12）。

¹⁴⁶ 山中樵，〈南洋に関する圖書〉，《臺灣時報》（），頁 52～53。

¹⁴⁷ 宮川次郎（編），《台灣·南支·南洋パンフレット（24）》（台北：拓殖通信社支社，1926.9），無頁碼。

督府從 1912 年迄今在「南支南洋施設費」投下了 500 萬圓以上，而利用台灣的經驗前進南方對日本來說最為妥當，同時也批評總督府的南洋調查不夠徹底；儘管如此，日本國內更是不徹底，目前只能以總督府的調查研究為主，尤其總督府還設了官房調查課，專門從事著南方調查；固然，總督府無法免於未加活用的過錯，但日本國內對此方面的不熱心亦須受到責備。¹⁴⁸

1935 年，總督府力陳增設外事課的理由當中，對於調查課所主管的南支南洋等制度與經濟調查，謂其成效甚大，咸認是此一方面具有權威性的資料，因而欲將在 1924 年被併入文書課的外事係與調查課的調查係加以合併；根據總督府的統計，從 1914 至 1934 年度，該課所發行的出版品，計有《南支那及南洋調查書》二二七冊、《海外調查書》十三冊、《南洋年鑑》二冊、《內外情報》一五九冊、《南支那及南洋情報》八一冊，總計四八二冊。¹⁴⁹顯然，總督府相當肯定調查課所累積的成果，同時希望以此彌補較為薄弱的外事係。

1932 年 10 月，武道社發行《南支那海之一大寶庫海南島》，《南方土俗》一面介紹該書的內容，並表示關於海南島的文獻，日本國內幾乎沒有出版，僅能依據總督府調查課出版的《海南島事情》與光緒補刻的《瓊州府誌》等，而別無其他方法，直到本書問世才填補了利用上的不足。¹⁵⁰

1941 年，《新亞細亞》雜誌曾經企劃「要了解南洋，應讀什麼書好呢？」的徵文活動，其中，有不少人推薦了台灣總督府所編輯的《南

¹⁴⁸ 宮川次郎（編），〈南洋貿易の振興策〉，《台灣・南支・南洋パンフレット（29）》（台北：拓殖通信社支社，1926.10），頁 1~16。

¹⁴⁹ 《樞密院會議文書》，〈台灣總督府官制中改正ノ件〉。（資料來自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調查課在 1933 年度所分配到的南支那及南洋施設費為 4 萬 7880 圓，在 1934 年度則是 4 萬 8798 圓，前後 2 年的總額皆為 58 萬 2862 圓，故所佔比例相當於 8%；至於費用的細目如下表所示：

| 年度 | 南洋協會補助 | 南洋協會台灣支部補助 | 台灣時報發行補助 | 各種支薪 | 圖書與印刷費 | 物品費 |
|------|--------|------------|----------|-------|--------|------|
| 1933 | 14000 | 4000 | 1500 | 20700 | 6680 | 1000 |
| 1934 | 14000 | 4000 | 1500 | 21945 | 6680 | 673 |

¹⁵⁰ 彙報，〈南支那海之一大寶庫海南島〉，《南方土俗》第 2 卷 3 號（台北：南方土俗學會，1933.10），頁 76~77。

洋年鑑》，包括評論家川端福一、渡邊勝家及農林省的宗像正一，後者認為本書記載南洋的整體，並且相當值得信賴。¹⁵¹台北高商出身、任職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的宮原義登，則很有自信地表示，希望想認識泰國的人，可以參閱《南洋年鑑》與該局所編纂的《南洋叢書》中的泰國篇，此外，同樣隸屬調查局的北博，也認為儘管上述二書並非新近出

1935年9月，日本駐廣東總領事河相達夫向外務省所作的報告題為「關於總督府的華南發展的中文報紙報導翻譯之件」，指出當地《民國日報》刊載〈日本南進〉一文，略謂：日本對中國大陸的政策從田中首相以降不斷積極進行，大陸政策的先驅為北進政策之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南進政策則是官房調查課與南支那及南洋調查書（原文作「處」，因二字發音相同之故），在北方政策已獲致成功的日本，近來極力加速南攻的腳步。總督府針對南支南洋樹立了十年計畫、五大政綱，首先將重點置於文化設施，正在充實總督府立的廈門與福州之博愛醫院、廈門的旭瀛書院、福州東瀛書院，並且拓充《閩報》與《全閩日報》，以及援助本願寺的佈道所，最近要在福州創設醫學專門學校和資源調查處；另一方面，總督府內部除了對華外事課的增設之外，更進而創立此等文化機關的統制機關之「南支那協會」，由其加以負責管理。¹⁵²

¹⁵¹ 〈南洋をるにはどんなをよめばいゝのか〉(一)，《新亞細亞》第3卷4號（：，1941.4），頁89~93。

¹⁵² 《外務省記録》，〈昭和10年9月4日から昭和10年9月9日（日本ニ關スル外國新聞記事關係雜纂）〉。（資料來自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